

# 《阿Q正传》多个英译本差异性的多维分析

缪琦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8日

## 摘要

鲁迅的《阿Q正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其英译历程跨越近百年, 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研究选取梁社乾(1926)、杨宪益与戴乃迭(1972)以及蓝诗玲(2009)的三个英译本, 构建平行语料库, 采用多维度分析(MDA)方法, 系统考察译本在宏观文体维度上的分布差异, 并揭示其微观语言特征动因。研究发现, 三个译本在“叙述确定性”与“指称明晰性”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模糊限制语与平均词长是导致风格分化的核心语言特征。从知识翻译学的理论视角看, 译者在处理作品中“地方性知识”翻译时采取的知识重构策略不尽相同: 梁译本追求“肯定 + 典雅”的古典化路径, 杨戴合译本体现“肯定 + 通俗”的思想传递倾向, 蓝译本则呈现出“试探 + 通俗”的当代化体验。

## 关键词

《阿Q正传》, 翻译研究, 多维度分析, 知识翻译学, 译者风格

##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Several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Qi Miao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rch 3, 2026; accepted: March 22, 2026; published: April 8, 2026

## Abstract

As a classic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has traversed nearly a centu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 yield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s that have become important subjec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study selects three English versions translated by George Kin Leung (1926),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1972), and Julia Lovell (2009) to

construct a parallel corpus. Employing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MDA) in conjunc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s in macro-stylistic dimensions across the translations and identifies the micro-linguistic features underlying these differences. The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variations among the three translations in the dimensions of Narrativity and Referential Explicitness, with Hedges (HED) and Average Word Length (AWL) emerging as the core linguistic features contributing to stylistic differentiation. Further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lens of Transknowletology, this study uncovers three distinct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translators in handling Chinese local knowledge: Leung's translation pursues a classicizing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assertiveness + formality"; the Yangs' translation embodies an ideational orientation marked by "assertiveness + colloquialism"; Lovell's translation presents a contemporary experiential reconstruction featuring "tentativeness + colloquialism".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tylistic variations across translations are fundamentally products of translators' cognitive stanc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reproduction.

## Keyword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ranslation Research,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ransknowletology, Translator Sty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鲁迅的《阿Q正传》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文本之一。自1926年梁社乾首次将其译为英文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英译历程中，先后涌现出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本（以下简称“杨戴合译本”）、威廉·莱尔英译本（以下简称“莱译本”）、蓝诗玲（以下简称“蓝译本”）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成为翻译研究中反复审视与深入剖析的对象。

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从语言学、文体学、叙事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对《阿Q正传》的英译进行了广泛探讨，研究方法也从早期的定性感悟逐步拓展至基于语料库的量化实证。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某一译本或某一语言层面的分析，缺乏对多个译本在宏观文体维度与微观语言特征之间系统关联的整合考察。同时，尽管“文化转向”后的研究已关注翻译的社会历史语境，但对译本差异背后所体现的“知识重构”机制仍缺乏理论化的阐释框架。

知识翻译学(Transknowletology)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以“知识”为本体的新范式。该理论强调译者在“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其“真、善、美”三重维度的方法论原则为理解译本风格差异背后的知识重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1]。

基于此，研究提供构建“宏观定位-微观归因-理论阐释”的分析路径，选取《阿Q正传》三个代表性英译本，考察译本在宏观文体维度上的分布差异及其微观语言特征动因，并进一步从知识翻译学视角阐释译者风格差异背后的知识重构策略。

## 2. 研究现状

《阿Q正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的代表作，凭借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叙事风格与深厚的文化负载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本研究以“阿Q正传”和“英译本”为主题词在CNKI数据

库中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为2026年1月31日，检索范围包括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共检索到文献104篇。随后，作者将在CNKI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文献数据以Refworks格式导出，以方便后续利用Vosviewer(1.6.20)软件工具进行图像生成。在生成过程中，考虑到软件识别得到的关键词数量较少(仅216个)，作者将阈值设置为2，由此得到关联性较强的关键词共56个。随后，作者通过关键词聚类操作，获得叠加可视化图谱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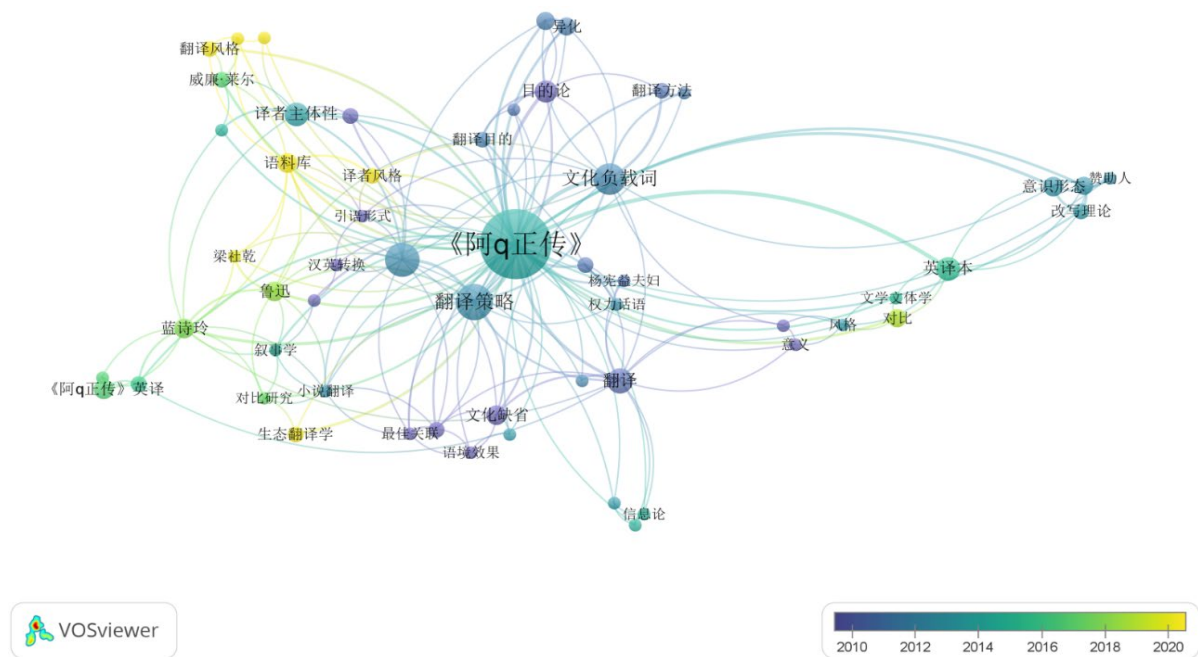


Figure 1. Overlay visualization map of research keywords in studies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图1. 《阿Q正传》英译本研究关键词的叠加可视化视图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作者发现有关《阿Q正传》的英译研究呈现出从传统语言文本分析到现代文化社会视角研究，从定性感悟到定量实证的清晰演进脉络的特征。早期及相当一部分研究立足于语言学本体，关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风格再现和文体等效问题。文化负载词翻译是最受关注的研究焦点之一。大量研究对比分析了杨戴合译本与莱译本或蓝译本在处理文化专有项时采用的策略差异，如人名、地名、詈骂语、成语典故、民俗观念等。普遍结论是杨译多采用异化策略，通过直译、直译加注等方式力求保留原语文化特色，服务于向外推介中国文化的目的；而莱译本、蓝译本等西方译者则更倾向于归化策略，如意译、替代、省译等，以增强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读性和接受度。杨小建等人(2009)通过对杨戴合译本和莱译本的《阿Q正传》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比较，得到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首先应做到了解译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在明晰词义的基础上再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翻译的基本要求[2]。这类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对文化信息传递的决定性影响。

随着文学文体学和叙事学理论的引入，研究视野扩展到对原作文学性、艺术性的传达。吴娟(2011)从文学文体学角度对比分析了译本在词汇、句法、修辞及叙事声音再现上的效果，探讨何种翻译更能传达鲁迅反讽、冷峻的文体风格[3]。霍跃红和王璐(2015)则从叙事学视角，聚焦于人物话语表达方式和叙事视角的转换，发现译者在跨语言转换中常出现“叙事视角的转移”，如从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倾斜，或对原文的引语形式进行调整，这直接影响作品的审美效果和读者感知[4]。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科学支撑。学者们通过自建平行语料库与可比语料库，从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平

均句长、词汇密度、高频词、衔接手段等参数进行数据统计，客观描述了不同译本的量化特征。蒋跃等人(2017)研究发现杨译用词简洁、句式贴近中文结构；莱译口语化特征明显，可读性高；蓝译词汇丰富度最高，但句式调整较大[5]。这种方法使对译者“风格”的描述从印象式判断转向了实证性分析。语言学与文体学视角的研究夯实了《阿Q正传》英译研究的文本基础，细致揭示了语言转换的机制与挑战。其研究结果表明，绝对的对等难以实现，译者的策略选择本质上是如何在“忠实于原文形式与文化”与“适应目标语规范与读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类研究为评价译本质量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艺术维度。

受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文本之外，探讨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超语言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与塑造。白玲(2015)认为杨译产生于新中国初期，其“求真”于原文的异化策略深受国家外宣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而莱译和蓝译则更受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和商业出版社对可读性与市场接受度的要求驱动，表现出更高的“务实”性[6]。

研究者普遍承认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邓文娇(2016)引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将译者的“惯习”与其所处的“场域”和拥有的“资本”相联系，深刻阐释了杨宪益的“文化使者”惯习、莱尔的“学者型”惯习以及蓝诗玲的“读者导向”惯习如何在其译本中留下鲜明烙印[7]。文化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将《阿Q正传》的英译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中，有力地证明了译本的面貌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语境下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产物。它使我们认识到，对译本的评判不能脱离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对“何谓好的翻译”有了更辩证、更丰富的理解。

除了主流理论，一些学者尝试运用新兴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来审视《阿Q正传》的英译。魏赛男(2024)运用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将翻译视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做出“适应性选择”的过程。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角度，对比分析了不同译者如何适应各自的生态环境，从而选择了不同的翻译路径[8]。该理论为理解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提供了动态的整体视角。新兴理论的应用丰富了《阿Q正传》英译研究的理论武器库，展示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和活力。这些研究说明，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翻译批评范式，从不同理论视角切入，可以对同一翻译现象获得多元而深刻的认识。

综合现有文献，《阿Q正传》英译研究呈现出方法多元化、视域纵深化和对象延展化的显著特征。然而，研究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绝大多数研究集中于译文生产端，而对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实际传播、接受、评价和影响则涉及较少，多停留在理论推演，缺乏实证研究。虽有研究进行了历时梳理，但系统性地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译本如何折射出中西文化交流态势与西方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变迁，仍有深入空间。

总而言之，《阿Q正传》的英译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的微缩历史。对其丰富的研究成果表明，任何译本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译者发挥主体性，在源语系统与目标语系统的多种制约因素间进行协商与抉择的产物。理想的翻译并非追求与原作的绝对同一，而是在充分认识并协调这些内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未来的研究可继续拓宽视野，从而为中国文学、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镜鉴。

### 3. 研究理论

知识翻译学(Transknowletology)是由中国学者杨枫于2021年正式提出的翻译学新范式，实现了翻译研究从“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到“知识转向”的跃迁。知识翻译学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三大脉络。其一是哲学认识论根基，该理论根植于哲学对“知识”本质的千年追问，将翻译从技艺层面提升至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哲学高度。它回应了“何为知识”、“知识如何可能”等根本性问题，认为翻译是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的基本方式之一。其二是学科内驱与范式批判，这是对翻译研究历经“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后的深刻反思与超越。他批判传统译学存在“因用忘体、见器失道”的局限，即过

于关注语言、文化、社会等翻译的“用”和“维”，而忽视了“知识”才是翻译活动处理和再生产的唯一“本体”。该理论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知识跨文化流动加速的趋势，旨在为解决如何更有效、更公平地促进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本土化建构的重要成果。

知识翻译学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一个本体，三重维度”。“一个本体”是指翻译即知识再生产。知识翻译学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也不是单纯的文化信息传递，而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知识加工、重构与再传播的社会实践。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知识的再生产，其最终产品是新的知识形态。“三重维度”是指“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方法论原则。这是知识翻译学指导翻译实践与批评的核心准则。以真求知作为知识的准确性维度。要求译者深入探究源文本知识的本原，忠实传递概念、事实与逻辑，确保知识的科学性。它体现为对术语的精确对等、对史实的严谨考据、对概念内核的准确把握。以善立义是知识的伦理与效能维度。强调翻译的伦理适配性和受众接受度。要求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背景和伦理观念，通过必要的注释、改写、语境化等策略，弥合文化差异，促进知识的有效流通与和谐接纳，实现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转化。“以美行文”是知识的审美维度。追求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感染力。它要求译者注重语言的诗学再造、韵律节奏和风格再现，使知识能以优美的姿态抵达读者，增强传播效果与审美共鸣。知识翻译学从本体论、方法论到实践层面，对翻译研究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它以“知识”为核心，贯通了地方性与世界性、人文性与科学性，为翻译学提供了元学科支撑，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尽管在概念深化、实证支撑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但其以“真、善、美”追求知识再生产与文明互鉴的理论旨趣，不仅为中国翻译学的理论自信与学科自主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理解翻译在人类知识体系演进中的能动作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未来，通过持续的理论对话、扎实的实证研究以及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知识翻译学必将在推动跨文化理解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框架，将翻译视为知识跨文化重构的过程，聚焦于《阿Q正传》三个英译本在文体风格上的差异，探讨译者如何在“真、善、美”三重维度的方法论指导下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进行选择吸收与创造性重构，进而从知识生产的层面理解翻译作为跨文化重构活动的本质特征，为《阿Q正传》英译研究提供可参考的阐释路径。

#### 4.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的三个《阿Q正传》英译本分别为：1) 梁社乾翻译的早期版本(*The True Story of Ah Q*, 1946, 以下简称“梁译本”)；2) 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权威版本(*The True Story of Ah Q*, 1972, 以下简称“杨戴合译本”)；3) 蓝诗玲翻译的企鹅经典版本(*Ah Q-The Real Story*, 2009, 以下简称“杨译本”)。为确保数据的信度与效度，研究对原始文本进行了严格的预处理，剔除译者序、注脚、尾注及出版信息等非正文内容，并将所有文本转换为 UTF-8 编码的纯文本格式，以消除元数据对风格统计的干扰。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首先，利用多维度分析标注器(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agger, MAT)作为特征提取工具。MAT 基于 Biber 的语料库文体统计学理论，能够自动识别并标注文本中涵盖词汇、语法及功能层面的 67 个语言特征，为风格量化提供高维数据支持。随后，作者利用 Python 对标准化后的频率数据进行两阶段统计分析：第一阶段采用主成分分析进行降维处理，通过凯撒准则提取特征值大于 1.0 的核心主成分，构建区分译本风格的宏观维度坐标系；第二阶段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将宏观维度得分设为因变量，具体语言特征设为自变量，通过计算决定系数与回归系数，锁定导致风格差异的微观语言动因。通过“宏观定位 - 微观归因”的数据链条，结合知识翻译学理论对译本的风格画像进行深层阐释。具体技术路线如下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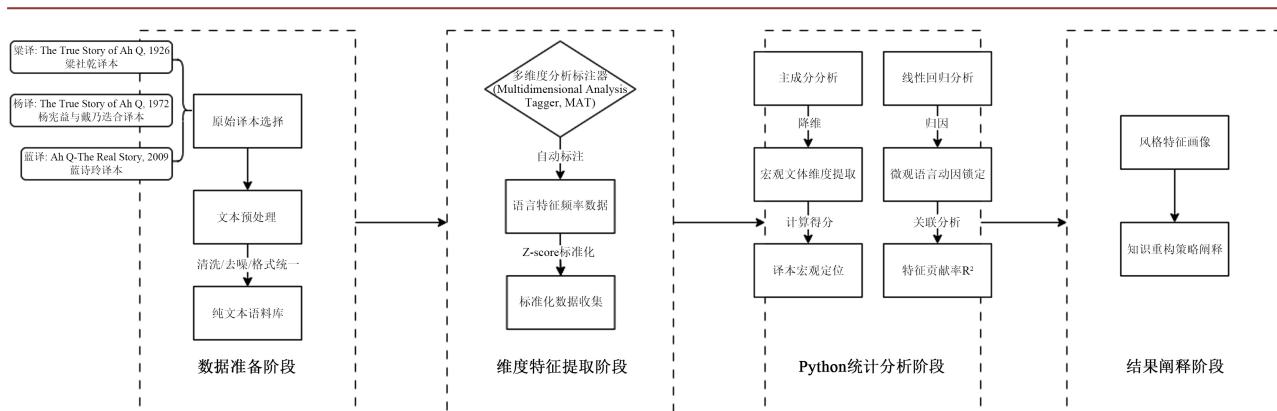


Figure 2. Flowchart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图 2. 《阿 Q 正传》英译本对比研究流程图

## 5. 研究结果

### 5.1. 宏观维度的构建与译本定位

根据 MAT 多维分析结果，杨戴合译本被归为“想象性叙述型文本”，梁译本和蓝译本均被归为“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各译本的维度得分如表 1、表 2 和表 3 所示。基于三个英文译本的 6 个维度的对比分析，作者发现杨译本在整体上展现出最为显著的文学性倾向，其维度 2 (叙述确定性)的平均值高达 6.71，尤其在第八章达到 11.03 的峰值，同时维度 1(情感参与度)相对最高(-2.58)，维度 5(信息抽象度)也以 3.34 居首，表明该译本注重叙事张力与情感渲染，语言较为抽象，整体风格偏向“想象性叙述型文本”。然而，其维度 3 (指称明晰性)为负值(-1.17)，显示指代相对模糊，且各章节在“想象性叙述型文本”与“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之间波动，风格一致性较弱。杨戴合译本则体现出明确的说明性特征。其维度 3 平均值为正的 0.49，是三个译本中唯一在指称明晰性上整体为正的，且维度 6(在线性产出特征)以 0.78 为最高，说明其语言线性流畅、指代清晰。同时，其维度 1 值最低(-5.21)，情感最为疏离客观，维度 2 虽高(7.07)但波动平缓。值得关注的是，其九个章节中有八章被标注为“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显示了高度统一的说明性翻译策略。相比之下，蓝译本在各个维度上取值最平衡，最突出的特点是维度 2 平均值(3.58)显著偏低，叙述性明显弱于前两个译本。同时，其维度 3 (-1.65)与维度 5(1.87)均为最低，表明其指称最为模糊，且信息表达最为具体。整体上，蓝译本在情感距离、劝说性等维度上介于梁译本和杨译本之间，但未在任何单一维度上表现突出，风格上明显向“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倾斜。

Table 1. Six-dimensional scor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eorge kin Leung

表 1. 梁社乾版英译本分章节六维度得分统计结果

文件名	梁译本						文本类型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维度 4	维度 5	维度 6	
章节 01	-0.95	6.61	1.82	2.64	2.33	0.9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章节 02	-4.93	5.27	0.2	2.24	3.04	0.74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3	-5.63	8.16	1.07	-1.61	0.36	-0.4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4	-8.98	8.93	1.1	0.26	2.59	0.68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5	-5.08	7.88	-1.58	0.39	2.74	0.46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续表

章节 06	-4.34	5.46	0.75	0.2	1.89	1.93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7	-6.3	5.94	0.59	0.41	2.49	1.62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8	-4.23	9.08	0.76	1.63	2.63	0.34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9	-6.45	6.34	-0.34	-0.99	3.35	0.73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CORPUS	-5.21	7.07	0.49	0.57	2.38	0.78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Table 2.** Six-dimensional scor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表 2.** 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版英译本分章节六维度得分统计结果

杨戴合译本							
文件名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维度 4	维度 5	维度 6	文本类型
章节 01	-1.58	5.89	0.93	2.51	5.66	1.12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章节 02	-3.80	6.92	-0.96	1.49	6.58	-0.72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3	-2.36	6.73	-1.99	-0.29	4.31	-0.28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章节 04	-5.57	6.04	0.67	4.78	1.86	0.53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5	-1.46	6.58	-3.81	0.49	3.13	-0.64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章节 06	0.76	6.55	-1.38	-0.04	1.25	1.48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章节 07	-4.94	5.26	-1.64	0.87	3.17	-0.67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8	0.69	11.03	-1.23	2.17	3.00	-1.12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章节 09	-4.92	5.38	-1.15	0.12	1.11	0.31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CORPUS	-2.58	6.71	-1.17	1.34	3.34	0.00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Table 3.** Six-dimensional scor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by Julia Lovell  
**表 3.** 蓝诗玲版英译本分章节六维度得分统计结果

蓝译本							
文件名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维度 4	维度 5	维度 6	文本类型
章节 01	-0.60	2.21	-0.67	1.14	1.02	-0.45	交互劝说型文本
章节 02	-2.00	2.88	-1.52	2.56	2.79	-0.50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3	-3.53	3.55	-3.48	-0.82	2.36	1.21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4	-5.61	4.78	-0.22	2.46	2.14	-0.09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5	-1.36	4.48	-4.39	0.04	1.12	0.15	想象性叙述型文本
章节 06	-5.37	3.41	-0.49	1.14	3.34	0.71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7	-3.55	3.22	-0.66	2.19	1.79	0.37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8	-6.08	4.11	-1.23	0.72	1.27	-0.81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章节 09	-7.40	3.59	-2.20	0.09	0.99	0.03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CORPUS	-3.94	3.58	-1.65	1.06	1.87	0.07	一般叙述说明型文本

在差异性分析的统计方法上,三个译本各自九个章节中的6个维度数据通过夏皮罗-威尔克检验(Shapiro-Wilk Test)进行正态性分析得到的检验结果显示部分维度的数据并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 $P < 0.05$ )。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且三个译本的数据呈现配对性质。因此,本研究统一采用非参数的弗里德曼检验来考察三个译本在各维度上的总体差异,并使用肯德尔和谐系数(Kendall's W)来量化差异的效应量。具体的正态性分布统计检验结果及效应量排名如表4所示。根据Kendall's W的排序,维度2和维度3是区分这三个译本风格的最关键指标。

**Table 4.** Results of normality distribution statistical test and effect size ranking

**表 4.** 正态性分布统计检验结果及效应量排名

维度	P 值(显著性水平)	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梁译本/杨戴合译本/蓝译本)	W 值	结果解读
维度 1	0.0970 (ns)	是/是/是	0.2593	差异不显著
维度 2	0.0009 (***)	否/是/是	0.7778	差异极大
维度 3	0.0006 (***)	是/是/是	0.8222	差异极大
维度 4	0.3679 (ns)	是/是/是	0.1111	差异不显著
维度 5	0.0970 (ns)	是/否/是	0.2593	差异不显著
维度 6	0.0498 (*)	是/是/是	0.3333	差异显著

\*Kendall's W 数值越接近 1,说明三个译本在该维度上的区别越大。

## 5.2. 风格差异的微观语言归因

在发现三个译本在维度 2 与维度 3 上存在显著的分布差异后,本研究依据相关系数的大小进行排序以筛选出与维度得分相关性最为显著且强度最高的特征,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micro-language features of core style dimensions

**表 5.** 核心风格维度的微观语言特征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拟合优度(R <sup>2</sup> )	回归系数( $\beta$ )	P 值	显著性水平
维度 2	模糊限制语(HDG)	0.328	-4.820	0.0018	**
维度 3	平均词长(AWL)	0.424	5.055	0.0002	***

根据表 5 可知,模糊限制语(Hedges, HDG)是预测维度 2 得分的最强负向因子。该特征具有极高的统计显著性( $P = 0.0018 < 0.01$ ),且单一变量即可解释该维度 32.8%的变异( $R^2 = 0.328$ )。回归系数为负( $\beta = -4.82$ ),表明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越高,维度 2 的得分越低。蓝译本维度 2 得分低,为 3.58,由于维度 2 与 HDG 呈负相关,低分意味着高频使用模糊限制语,如 maybe、perhaps、likely、sort of 等。因此,蓝译本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试探性的翻译策略,使用了更多的限定词来避免过于绝对的表达。梁译本和杨戴合译本维度 2 得分高,分别为 6.71 和 7.07,这意味着这两种译文极少使用模糊限制语,倾向于使用更加确定、直接的表述方式。

针对维度 3,平均词长(Average Word Length, AWL)被识别为最具解释力的正向预测因子。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更高( $R^2 = 0.424$ ),且显著性极强( $P = 0.0002 < 0.001$ )。回归系数为正( $\beta = 5.055$ ),说明平均词长越长,维度 3 的得分越高。梁译本在这方面得分最高,为 0.49,是三个译本中唯一的正值,与之对应较

长的平均词长。因此，梁译本表现出明显的书面化、正式化倾向。杨戴合译本合蓝译本得分均为负值，负分对应较短的平均词长。换句话说，二者更注重译文的通俗性和可读性，采用了更接近口语叙述的风格，使普通读者更易于接受。三个英译本关键维度的微观语言特征差异对照情况如表 6 所示。

**Table 6.** Comparison of micro-linguistic features of key dimensions in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s  
**表 6.** 三个英译本关键维度的微观语言特征差异对照表

维度	统计显著因子	影响方式	梁译本	杨戴合译本	蓝译本
维度 2	模糊限制词(HEG)	负向	低 HDG	低 HDG	高 HDG
维度 3	平均词长(AWL)	正向	长 AWL	短 AWL	短 AWL

### 5.3. 翻译风格的知识画像与阐释

在《阿 Q 正传》的英译过程中，鲁迅原作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构成了翻译的核心挑战，如文体辩难、宗法社会术语、江湖套话等。杨枫(2021)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 [1]译者对这些知识的处理方式直接决定了译文的风格画像。因此，在维度 2 和维度 3 上，模糊限制语和平均词长表现出的强负或强正相关性不仅是一个语言指标，更揭示了译者在认知立场上的差异。《阿 Q 正传》开篇关于“正传”名目的考证可作为考察译者的知识转换策略的绝佳样本。

例(1)

原文：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梁译本：To settle the matter once and for all, we might consider this a personal record; but judging from my own writing, which is in the dic-tion of wagon haulers and street mongers and very inferior in style, I dare not make more pretension than is seemly. So, as a last resort,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use as my title the two characters, “true story” taken from the phrase “Refrain from inconsequential speech; keep to the true story,” which is a favorite quotation of the novelists, who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the three religions and the nine schools. Even if these two characters should be erroneously considered to be taken from the book of the ancients, the “Su Fa Cheng Ch’uan,” there is no remedy for the situation.

杨戴合译本：In short, this is really a “life”, but since I write in vulgar vein using the language of hucksters and peddlars, I dare not presume to give it so high-sounding a title. So from the stock phrase of the novelists, who are not reckoned among the Three Cults and Nine Schools. “Enough of this digression, and back to the true story!” I will take the last two words as my title; and if this is reminiscent of the True Story of Calligraphy of the ancients, it cannot be helped.

蓝译本：Abbreviated biography won’t work either because there’s no full one around. When you come right down to it, what I’m writing here is going to be the only standard biography of Ah Q you’ll find anywhere. Of course I don’t dare forget my place and call it that, for the style is “vulgar” and the language I’ve cast it in is not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ics but rather the “vile vernacular of mere rickshaw boys and peddlars.” And so in the end I’ve taken my title from a phrase that’s popular among the storytellers, those lowly souls who have always been beyond the pale of the Three Doctrines and Nine Schools. Storytellers often end a long digression with the cliché, “Enough of this idle chatter, let’s get back to the real story.” That’s where I got my title from. And if “real story” in this context gets mixed up with the “real story” in that book left to us by the ancients, The Real Story of Calligraphy—well, sorry, I just don’t have the time to worry about all that.

例(1)原文中关于“引车卖浆者流”这一市井身份的表述，三位译者的处理方式不同。梁社乾的将其

译为“the diction of wagon haulers and street mongers”，刻意选用了“diction”而非“language”，并使用了“monger”这一古雅词，执行了明显的升格翻译。这种处理使其译文在维度3上表现突出，呈现出一种典雅、学术化的书面风格。相比之下，杨戴合译本则将其译为“the language of hucksters and peddlars”。这一译法选词，如“hucksters”，准确传达了轻蔑口吻，但整体用词相对中性、平实。其译文在维度2上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语气肯定直接，清晰、高效地传递原文信息与核心思想。而蓝译本的处理则最为大胆，译为“the ‘vile vernacular’ of mere rickshaw boys and peddlars”。她不仅使用了“vile”、“mere”等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形容词，还选用了更具时代特色的“rickshaw boys”，体现了其降格翻译与体验化重构的策略。此外，该译文还通过高频率的模糊限制语和口语化插入语刻意降低叙事确定性，如后文的“sorry”，拉近了与当代读者的距离，将经典去经典化。

策略差异在对待“三教九流”及整体反讽语气的处理上同样清晰。梁译本平实地处理为“the three religions and the nine schools”，杨戴合译本则将其译为专有名词格式的“the Three Cults and Nine Schools”，两者均以肯定、权威的语气传递概念。而蓝译本则在翻译“Three Doctrines and Nine Schools”之外，额外添加了“those lowly souls who have always been beyond the pale of...”这样的阐释性文字，传达了“不入流”的边缘化语义，进一步印证了其注重读者体验与意义阐释的倾向。在传递原文结尾“也顾不得了”的戏谑口吻时，梁译本的“there is no remedy”和杨戴合译本的“it cannot be helped”均保持了相对客观的陈述，而蓝译则创造性地加入了“well, sorry, I just don’t have the time to worry about all that”这样极具现代口语色彩和主观态度的句子，将原文隐含的反讽语气外显化，增强了叙事的互动性与幽默感。

例(2)

原文：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梁译本：Fourth, is the matter of Ah Q’s native district. If he were actually a Chao, we might, after the old and popular custom, which now prevails in telling of one’s native district, look among the footnotes in the general list of surnames and find something of this sort, “A native of Tien-shiu, Lung-hsi”; but it is regrettable that Ah Q’s sur-name is, after all, not wholly settled and hence his native district cannot be decided upon. Although he lived for the most part in Wei-chuang, he was often in the habit of living in other places, and so he cannot be considered a native of Wei-chuang. Were we to consider him a native of Wei-chuang, we would violate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modern history.

杨戴合译本：My fourth difficulty was with Ah Q’s place of origin. If his surname were Chao, then according to the old custom which still prevails of classifying people by their districts, one might look up the commentary in The Hundred Surnames and find “A native of Tienshui in Kansu Province.” But unfortunately this surname is open to question, with the result that Ah Q’s place of origin must also remain uncertain. Although he lived for the most part in Weichuang, he often stayed in other places, so that it would be wrong to call him a native of Weichuang. It would, in fact, amount to a distortion of history.

蓝译本：Four. The question of his native place. If his family name were definitely Zhao then I could follow the custom, so popular in present day biographical writing, of naming the ancient district from whence his family hailed. That way, basing myself on the standard reference, The Hundred Surnames and Their Places of Origin, I could assert with confidence that our Ah Q doth a Tianshui man of Longxi be. Trouble is, since it’s somewhat doubtful that Zhao was his family name in the first place, how can I assert with any degree of certainty where his family came from? Granted, he lived mostly in Wei Village, but he often spent time in other places too. And so if I wrote that Ah Q doth a Tianshui man of Longxi be, I’d be downright guilty

of violating the hallowed principles of historiography.

在关于阿 Q 籍贯的第二个例句中,这种对比得以延续和深化。对于“陇西天水人也”这一仿古表述,梁译本与杨戴合译本均采用平实的现代英语译法,即“a native of Tienshui in Kansu Province”,重在信息准确。而蓝译本则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仿古英语句法“doth a Tienshui man of Longxi be”,通过目标语自身的语体降格来模拟原文文白夹杂的戏仿效果,这是其“体验化”策略的又一体现。对于“有乖史法”,梁译本用词客观、学术,将其翻译为“violate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modern history”,杨戴合译本则直接有力,将其翻译为“a distortion of history”,而蓝译本则使用了“the hallowed principles of historiography”,这看似拉高了局部平均词长,但实则是为达成特定反讽的修辞效果而采用的策略性例外,强化了叙述者故作正经的幽默语调,其译本全局的用词基调仍是通俗的短词主导的。

综上所述,通过横向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三位译者的完整风格画像及其背后的驱动逻辑:梁译本追求“肯定+典雅”,通过高正式度与高确定性的语言,执行古典化与合法化的文化使命;杨戴合译本呈现“肯定+通俗”,以高确定性与中等正式度实现思想内容的透明化与高效传递;蓝译本则塑造了“试探+通俗”的独特风格,凭借高互动性与低正式度,致力于对经典文本的当代化、体验化重构与大众传播适配。作者认为这三种风格路径是译者在特定历史语境、认知立场与读者预期共同作用下,对鲁迅笔下“地方性知识”所进行的三种不同面向的“创造性重构”,没有优劣之分,共同印证了知识翻译学所描述的知识跨文化旅行动态过程。

## 6. 结论

本研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平行语料库,对《阿 Q 正传》三个代表性英译本进行了系统的风格对比考察,并从知识翻译学的理论视角阐释了其差异。在宏观文体维度层面,维度 2 与维度 3 是区分译本的最关键指标。微观语言归因方面,分析结果显示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是预测维度 2 的最强负向因子,而平均词长是预测维度 3 的最强正向因子。此外,作者引入知识翻译学理论对上述量化差异进行了理论阐释,发现三位译者对原文中蕴含的“地方性知识”采取了不尽相同的知识重构策略,这塑造了其独特的风格画像:梁社乾追求“肯定+典雅”的古典化路径,体现了知识重构中对文化传播与典雅风格的平衡;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通过“低模糊限制语+低平均词长”的配置,体现“肯定+通俗”的思想传递倾向,服务于特定历史时期对外文化宣传中思想透明化与高效传递的需求,更侧重于知识重构中的概念准确与传播效率。蓝诗玲则通过“高模糊限制语+低平均词长”的配置,塑造“试探+通俗”的当代化体验,其策略旨在拉近经典文本与当代英语读者的距离,通过互动性和口语化的叙事完成对文本的体验化重构,体现了对知识传播中受众接受与互动体验的融合。

## 参考文献

- [1] 杨枫.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5): 2+27.
- [2] 杨小建, 张慧琴, 吴菲, 等. 从《阿 Q 正传》的英译本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沈阳大学学报, 2009, 21(5): 96-98.
- [3] 吴娟. 文学文体学视角下《阿 Q 正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1.
- [4] 霍跃红, 王璐. 叙事学视角下《阿 Q 正传》的英译本研究[J]. 大连大学学报, 2015, 36(2): 76-81.
- [5] 蒋跃, 王乐韬, 詹菊红. 基于语料库的《阿 Q 正传》两个英译本的风格研究[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7(3): 113-121.
- [6] 白玲. 谈权力话语对译者的影响——以《阿 Q 正传》两个英译本为例[J]. 名作欣赏, 2015(26): 165-167.
- [7] 邓文娇. 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译者惯习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大学, 2016.
- [8] 魏赛男.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阿 Q 正传》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中南民族大学, 2024.